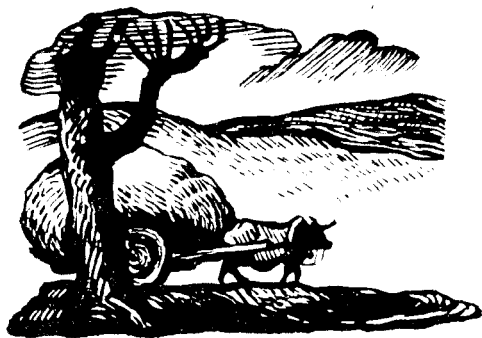


苏金平诗选





苏 金 伞 诗 选

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

一 九 八 三 年 · 北 京

封面、扉页设计：史 果

苏金伞诗选

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出 版

(北 京 朝 内 大 街 166 号)

新 华 书 店 北 京 发 行 所 发 行

北 京 新 华 印 刷 厂 印 刷

字 数 104,000 开 本 787×1092 毫 米 $\frac{1}{32}$ 印 张 6 插 页 2

1983 年 3 月 北 京 第 1 版 1983 年 3 月 北 京 第 1 次 印 刷

印 数 0,001—1,850

书 号 10019 · 3394 定 价 1.00 元



作者近影

序

一九二〇年我考上河南省立开封第一师范，正是“五四”运动的第二年，革命浪潮还在继续，新诗刚刚萌芽。从那时起到今天，六十多年来，我一直是新诗的忠实的读者，也是坚持不懈的新诗习作者。

胡适的《尝试集》，郭沫若的《女神》，是我得到的最早的两本诗集。这两本诗集，有迥然不同的风格。《尝试集》是在中国古典诗歌的基础上变化出来的，带有旧诗词的味道。《女神》则完全以崭新的形式闯进诗坛，这种形式无疑是受外国诗的影响。中国新诗一开始就是从这两条路上发展起来的。

随后外国的诗大量翻译过来。外国诗也有格律诗，也有自由体。不论格律诗、自由体，一经翻译到中国来，都成为中国新诗的营养了。外国的格律诗翻译成汉文，不可能保持原有的格律，正如中国的律诗翻译到外国，不可能保持原来的格律一样。

中国新诗的路子越走越宽，逐渐脱离开中国诗歌的旧形式，走上全新的诗歌创作的新道路。

这好不好呢？是否是抛弃了中国的优秀传统，成为

一种谬种流传呢？

我的理解是：中国的古典诗词，具有极高的艺术价值，同时又是从民间产生发展起来的。在漫长的封建时代，中国诗体一直沿着它固有的道路发展着。可是“五四”以后，随着外国诗歌大量翻译过来，诗的门禁打开了，诗的视野宽阔多了，诗的营养丰富多了。不止把外国诗翻译过来，而且还有用它们的形式写诗的，如英国的商籁体（十四行）、日本的俳句。各种派别的诗也介绍过来了，如浪漫派、印象派、现代派等等。

这些，对中国新诗都是有影响的，对我当然也不例外。

问题是：对中国古典诗歌怎么办？怎样接受这份优秀的遗产？我认为：它不应该是因袭旧形式，而主要是接受中国诗歌几千年来的现实主义传统、高度艺术概括的手法等等。就象吃东西一样，经过咀嚼消化，吸收排泄，变成营养。“五四”以来的新诗正是这样做的，所以认为它只是接受了外国诗的影响，背离了中国的传统的看法是不全面的。

“五四”以来发展起来的新诗，已具有深厚的根基，成为今天新诗发展的优良传统。有的人不承认它，这种态度，以及他们的理论，当然不能和新诗刚萌芽时遭到封建文人的抵制相提并论，但至少可以说对中国新诗的发展是不理解的。有人仍然坚持写旧诗，这是各人的爱好，用不着反对，但也无须以此反对新诗。

在“五四”新文学运动中,没有提出向民歌学习并把民歌作为新诗体的口号。但用口语入诗,而口语又是经过提炼了的群众的语言,因此新诗也是有群众基础的,要不然,怎么会很快地流行开来?学习民歌,应该是学习它植根于生活和人民血肉相连的传统,学习它的语言和表现手法,而不应单单停留在句型上。民歌是人民自发创作的,由某些人操笔代劳也名之为民歌,是说不过去的。指使农民编民歌,立赛诗台,那都是违反艺术创作规律,纯粹以主观意图搞瞎指挥,其结果必然败坏了读者的胃口。

以上这么一些,就是我对新诗的基本观点。我就是根据这种观点写自己的诗的。但我的创作道路却有几次转变。一九二九年出狱以后,栖身体育场上,日与皮球为伍,成了中原有名的运动员。同时试着练习写诗,这是我的爱好。我喜欢艺术性高,写得深厚一些的诗,浅露地说明观点而缺乏艺术性的诗,我是不喜欢的。我推崇鲁迅的诗,鲁迅的旧诗写得又深刻,感情又炽烈,我喜欢这样的诗,新诗也应该这样写。

我正式发表作品,开始于三十年代,第一首诗《出狱》发表在一九三四年六月号《现代》文学杂志上。因为是亲身遭遇和真实情感,写来不加雕琢,比较自然;实际上也开始显示了自己的诗风。因此把这首诗选在这里。

《大公报·文艺》专页常登卞之琳、何其芳、李广田等人的诗,我喜欢这种诗,所以也喜欢往上面投稿,大多也

能登出来。这些诗原稿早已丢失，登在当时报刊上的，搜寻不易，在这个选集中只好从略了。但有一首诗保留下来了，这就是《雪夜》。它发表在《新诗》上，被闻一多选入《现代诗抄》，现存《闻一多全集》第四卷。可作为那一时期我的创作的一点踪迹。

抗战开始，国共合作，全国文艺界活跃起来了，对于我，不论思想，还是创作，也有了一个转变。写了一首《我们不能逃亡》，发表在《七月》第二期上。

四十年代，是我发表诗最多的一个时期，也写得比较好。当时有三种思想感情在心中鼓荡与交织着：一种是反对日本侵略的爱国心；一种是国民党不断地发动反共高潮，卖国投降的嘴脸日益暴露，对知识分子、进步人士残酷迫害，无情镇压，因而激起心中的仇恨；一种是对共产党的倾慕。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，坚持抗日，反对投降等项政策深入人心。很多文艺界朋友都到了延安，不断地从抗日根据地和前线传来一些振奋人心的消息，这些都使我鼓舞兴奋。再一种情况，就是国民党消极抗日，借机抓兵派差，搜括民财，人民生活日益困苦，日本人一来，又得流离失所，妻离子散，这引起我深深的愤慨和同情。

由于以上几种感情不断在胸中翻涌，要求发泄出来，因此灵感往往猝然而至，随手写来，就是一首比较完整的诗。

日本投降以后，国民党违背全国人民的意愿，撕毁

《双十协定》，悍然发动内战，这使我的感情又提升了一步，“反内战、反饥饿、反迫害”的情绪燃烧着我的心。从一九四六年到一九四八年这两年写的诗，全部内容都是围绕这个中心。一九四七年出版的诗集《地层下》和一九四八年的《窗外》，把这一时期的诗都收进去了。现今的这个选集，也以这个时期的诗选入的较多。可惜四十年代初期有一本诗集，交重庆出版，广告已登出，但因日本投降，经手人不知何去，连原稿也丢失了。

一九四六年到一九四八年，我写的几乎全部是政治讽刺诗，一九四六年《大公报》评论我的诗“讽刺深刻得体”，我想无非是说，这些诗讽刺虽尖刻，但却含蓄，有诗的味道。

一九四八年我到解放区。这对于我是一个极大的转折。从一个我所极端憎恨的地区，来到一个我衷心倾慕的地区，精神上无比愉快的。但创作上的转变，却需要一个过程，一来是对解放区的情况不熟悉，不知应该怎样写；二来歌颂要比讽刺难；三来，诗的情调（包括形式）也得转变。而诗的形式却苦恼了我。

到解放区以前的诗，我用的是比较自由的形式，字句不要求整齐，连韵脚也不押，随着感情的起伏，语气的轻重，运用自然的节奏，不加雕琢，不凑句凑韵。

到解放区以后，再这样写觉得不合时宜了。报刊上刊登的是大量的快板、顺口溜以及民歌之类。我怎么办？也用这种形式，我不大习惯。说实在的，思想也有些抵

触。每一个学习运动,我都检查自己的这种思想,但又总改不了。于是就用所谓押大致相近的韵,形式大致整齐这种办法试着写诗。这就是四行一节,每行字数勿过长过短。这种形式一直到现在还在沿用。这种形式来自外国。“五四”以后,新诗采用这种形式也很普遍。这种形式也有缺点,为了每节四句,就得凑字凑句。为了凑韵,有时破坏了原意,如果词藻陈旧,就成了陈腔老调。

至于内容,解放后,文艺为政治服务是不容怀疑的,因此各种政治事件在我的诗里都有反映。两次参加土改,因此写土改的诗较多。也有图解政策的地方。以后合作化、大跃进,我被错划为右派,没资格反映这些东西了,要不然,它们也会在我的诗里出现的。说不定还会走到赛诗台上参加赛诗呢。

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,是不许通过“自我”来抒发感情的,因此凡是诗里有“我”字的地方都必须写成“我们”。从作品里抽掉(或者削弱)了抒情个性和真情实感,所以总是不能使人感动。但有时有些事物和人真正感动了自己,感情真正出之于肺腑,也能写出真正的诗来。

在我被错划为右派的二十多年中,没有写出几首诗。“左”的错误不仅影响了我的创作,更为痛心的是影响了中国文学的繁荣发展。这种“左”的东西,一九五七年以前也已存在,棍子已经有人在那里抡起来了。这种棍子我都亲身经受过,并没把我打伤,而“反右”和“文化大革命”,倒是真正把我送到绝境了。但是不管多么艰辛痛

苦，我终于走过来了。而被迫下放，“劳动改造”，使我和农民多年相处，和他们建立了感情，熟悉了他们的生活，对于创作反而起了有益的作用，这或者可以叫做“绝地逢生”吧。

要不是粉碎了“四人帮”，党召开了十一届三中全会，拨乱反正，平反冤假错案，落实了政策，我这一生也就彻底完结了，还发表什么作品！三中全会不仅挽救了中国的命运，也挽救了我和跟我具有同样命运的人。

粉碎“四人帮”后，我又写起诗来。但有一两年之久，作品却很难和读者见面，现在我才了解了真正的原因，原来极左思潮还在设置路障。直到一九七七年以后，《诗刊》、《人民文学》才最先发表了 my 诗。从这以后，两年多时间，陆续在全国各大刊物以及《人民日报》上发表了几十首诗。两年多的时间发表的作品超过了以往二十年。三中全会精神使我焕发了青春。由于思想解放，敢于触动过去的老框框，老调调，思想比较活跃，心情愉快，这就是我虽然年老还能写出诗来的原因。

回顾几十年来，“马齿徒长”，诗却没有写好。诗虽没写好，但我却有个老主意：

——我的诗是反映生活的，主要是反映农村生活。因为从小生长在农村，以后又不断地到农村去，对农村生活比较熟悉；

——在风格上力求朴实无华，带有泥土气息，并在朴实中透出清新，这种风格始终不变；

——在形式上不拘一格，企图做到形式和内容协调一致。

最后，我得感谢以下几位同志：

一九四六年到一九四八年，国民党统治区内形势险恶，白色恐怖严重，作品很难发表。我把诗寄给叶圣陶同志，他转给上海一些刊物（有的是党的地下刊物）发表，以后又蒙奖掖。他是我的前辈，我将终生感戴！

萧乾同志三十年代编上海《大公报》文艺专栏时，多次发表我的习作；一九四八年出版条件十分困难时，将我的诗集介绍给巴金同志在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，对我是一个很大的鼓舞；

张光年、臧克家同志在诗集出版和发表作品上对我也十分关怀；

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同志对我的这个选集，精心甄选，热情协助，使这本选集得以出版。

特在这里一并表示诚挚的谢意！

1981年

目 次

序.....	1
--------	---

第 一 辑

出 狱.....	3
雪 夜.....	5
稻草担子.....	7
斑 鸠.....	9
雨 后.....	11
无弦琴.....	15
睡 眠.....	18
摘棉花.....	20
窗 外.....	21
村 女.....	24
黄 叶.....	27
芦花和棉絮.....	29
货郎挑.....	31
鹅.....	34
徘 徊.....	36

你走了.....	38
小 屋.....	43
跟妈妈说.....	46
农人的脊背.....	49
秋天的小河.....	51
台阶上.....	54
雷.....	56
控诉太阳.....	59
头 发.....	61
民主和自由.....	65
眼睛都睡红了.....	69
破草帽.....	71
国民身份证.....	75
马 蹄.....	80
剩 余.....	82
鸪 鵒 鸟.....	84
地层下.....	87
歌的王国.....	89

第 二 辑

在汝河岸上.....	93
三黑和土地.....	96
豆.....	100
老牛回家.....	103

农技站派来一位女同志.....	107
场边夜话.....	110
红 灯.....	113
灯 光.....	115
在火车上.....	119
三门峡.....	122
花 园.....	124
矿山偶得.....	127
雨.....	130
扯 秧.....	132
歇 畔.....	137
燕 子.....	139
家.....	140
听苏殿选发言.....	143

第 三 辑

绝壁上.....	147
缆 绳.....	150
雷 声.....	151
春宵伴着细雨.....	153
最好的早晨.....	155
松花江呵.....	156
战 士.....	158
大 炮.....	159

寻 找.....	161
山 口.....	163
桐 叶.....	165
蒲公英.....	166
大麻叶.....	168
雪跟夜一般深.....	171
海的收获.....	173
海滨市场.....	173
贝 壳	174
在海边走着.....	175
海 浪	177

第 一 辑